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向度:理论基础、 历史演进与现实回应

郑洪辉^{1,2},王力¹

(1.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2. 武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吸纳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生态理念等人类生态文明智慧,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宝贵历史经验,回应了“生态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全球生态危机化解”等现实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中,要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向度的理论基础、历史演进、现实回应,不断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论;历史;现实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3)06-0048-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3}“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49-50},并围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49}作出系统安排,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反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高瞻远瞩、系统谋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达到新高度^[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同人类生态文明智慧的“对话”中,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宝贵历史经验的赓续中,在对时代之需、社会之要、人民之盼的回应中形成和发展的。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向度的理论基础、历史演进、现实回应,对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基础:人类生态文明智慧的继承创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广泛且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文明根脉,凝结着人类生态

文明智慧的成果。其中,既离不开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指导地位的坚持,使其能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又离不开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遵循,使其能够明晰行动指南和路线;也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其能够厚植中华文化基因;还离不开对西方生态理念的扬弃,使其能够避免重蹈西方资本逻辑带来的生态灾难覆辙。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立足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追求“人类解放”事业的过程中,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化解之道等问题也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形成了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生态思想。在对人与人的关系认识上,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161}。马克思提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158}。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既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也是物质食粮。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生产及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简言之,“人靠自然界生活”^{[3]161}。另一方面,“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3]162}。

收稿日期:2023-10-11

基金项目:2023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3X020)

作者简介:郑洪辉(1990-),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武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基础理论;

王力(1967-),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基础理论。E-mail:ZHH513@126.com

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在于“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162}。人类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大脑组织及思维机能,通过劳动获得自然产品,并能动地、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自然界,实现“人化自然”。但马克思也曾指出人“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209}。即在发展同自然的关系时,人类并不能随心所欲,要懂得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将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界会对我们进行报复。在对“自然界同人相异化”问题的认识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根源的实质。“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3]52}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攫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必然导致劳动异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等乱象的出现。在这些乱象之中,既包括了对劳动的占有和剥削,也必然包含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和掠夺,带来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生态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3]587},这是一种反自然、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逻辑支配下生产的盲目性、滞后性,直接导致与环境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冲突,最终产生人与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综合性的生态危机。”^[4]在对“人与自然和解”道路的认识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代之以公有制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生产和消费的一致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曾指出“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3]53}。通过计划生产来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妥善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实现之时,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185}。遗憾受时代条件等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专门系统论述过生态环境等问题,生态思想仅是零星散落在其庞大思想体系之中,但星星之火依然可以形成燎原之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之中,对我们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遵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凝结形成了以“十个坚持”为

主要内容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生态文明建设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于一体,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鲜明的思想旗帜和强大的理论武器。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在思想引领、组织领导、制度保障、作风建设等方面全面发力,保证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贯穿始终,确保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行稳致远,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根本保证。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依据和宗旨要求,从人类文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层面谋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愿景。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基本原则,对如何认识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解答,超越了过往“人”与“自然”的对立模式,开辟了人与自然相处的全新境界,在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实质的同时,也锚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的“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分别从核心理念、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等方面系统回答了如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理路。五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今世界生态现状发出的全球倡议,携手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共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共同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生态文明体系,拓展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视野。伟大思想指引伟大实践,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历史、立足当下、面向全球、着眼未来,拥有着深邃的理论内涵和务实的实践导向,以其特有的政治情怀、人民情怀、生态情怀、文明情怀、天下情怀,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了生机勃勃的真理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根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古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为此先人们提出了许多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存有内在契合性的观点和见解,其中部分观点虽略微粗浅或稍显局限,但仍不妨碍其穿越时空隧道,产生当代的回响和共鸣。一是强调“天人合一”的生态认知。“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对天人关系最为形象的表达,也是传统生态观的出发点。在儒释道等文化中提出的“天人本只一理”^{[5]414}“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6]14}“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7]146}等观点,无不传递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即人与自然同出一源,同存一体,同循一理,相生相长,不可分离,和谐平等。“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人类应充分尊重自然界的主体性,同时注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秉持人与自然同生、共存、平等的生态认知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对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合理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提倡“仁爱万物”的生态情感。“民胞物与”“物无贵贱”“众生平等”等理念是中华传统生态观所推崇的价值取向,其实质都是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作平等的主体,全部纳入道德关怀的对象,其中都蕴含着“仁爱万物”的情感内核。“仁爱万物”主张将“平等”“仁义”“慈爱”等情感由人与人之间,扩展至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给予自然万物仁爱,体现的是古人对自然界的真挚情感态度,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了爱的桥梁,是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状态的有效“催化剂”。三是推行“顺时节用”的生态准则。“顺时”指的是顺应自然规律,按照自然生发的时令开展与自然的互动。先人们主张的“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规范,强调的是顺应自然万物生长规律的重要性,唯有以时耕作、以时伐木、以时捕禽,才能让禽兽草木等自然万物依照各自的规律繁衍生息,确保自然的永续运转,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木材等自然资源。“节用”指的是节约、适用,将人类的合理需求与自然界可承受能力结合起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反映了古人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质朴理念。著名理学家朱熹曾提出“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8]340},告诫人类不能因为是万物之灵就毫无节制地索取、占有、掠夺自然资源,人类应心怀仁爱对待

世间万物,懂得顺应自然规律并控制自己无度的欲望,以“中和”为尺度,努力实现“天地位、万物育”的目标。时至今日,历经几千年实践所形成的生态智慧仍展现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更为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理论资源,使其镌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显示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

西方生态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借鉴。20世纪60年代初,以《寂静的春天》的发表为标志,敲响了西方国家生态保护的警钟,兴起了影响至今的生态保护运动,激起了浪涛奔涌的绿色思潮,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理念。尽管大部分理念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生态灾难反思的结果,其中的各种弊端和局限性难以掩盖,但仍不能忽视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产生的思想滋养及教训警示意义。一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中,辨清人与自然关系的奥义。“人类中心主义”包括“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等流派,其核心观点将人类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唯一存在物,将人类置于主体地位,自然界对人类而言仅是工具性的存在,人类利益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非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流派,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将关注的对象由人延伸至其他自然存在物,认为其他自然存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自身独立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都认识到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都割裂了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地强调人类的主导地位,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过于重视自然,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利益,甚至不惜将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二者始终无法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准确定位。二是积极扬弃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走出资本逻辑的陷阱。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代表性观点有技术创新论、社会变革与生态转型论、“弱化”与“强化”论等。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核在于始终围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这一目标,以“源头

预防”代替“末端治理”,希冀通过发挥科技革新作用,动员政府、市场、公众等多方力量参与生态现代化实践。囿于资本逻辑的困境,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未认清生态危机爆发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并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故导致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始终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殖民主义”“不可持续性”“技术至上”等局限。三是吸纳西方环境教育先进理念,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素养。随着西方生态保护运动的发展,西方的教育专家们在教育实践领域围绕环境教育目标、教育模式、效果评价等内容展开了多样的生态环境教育研究,形成了以卢卡斯、林克、亨格福德等学者为代表的生态教育理论。在我国开展全民生态教育、树牢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从中找寻有益的经验。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环境政治学等西方生态理念都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我们要始终怀抱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西方生态文明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积极因素。

二、历史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懈探索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推动绿色发展,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先后经历了萌芽、发展、完善和成熟等几个阶段,为“绿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方面建设百废待兴,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探索也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毛泽东秉持“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9]29}这一早在其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朴素自然观指导新中国生态建设。他认识到人类源于自然,又受制于自然,人类各项活动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不能为所欲为。面对这一时期频发的自然洪涝灾害,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先后开展了治理淮河、海河、荆江、黄河等四大水利治理工程,有效减轻了水患灾害,甚至实现转危为利。面对饱经战争创伤遭受灾难性破坏的

山川林木和生存环境,毛泽东同志发出“绿化祖国”^{[10]40}的号召,根据自然规律对绿化做出了“种树就要有计划地种”^{[10]52}“实行耕作三三制”^{[10]61}等具体要求,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影响至今的植树造林行动,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人居环境的改善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面对“一穷二白”的发展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缔造者们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一方面,大力组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出“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11]160},同时提倡在生产、生活中反对浪费;另一方面,主张综合利用各类废弃物,开发新能源,大大降低了自然资源的消耗量,缓和了生产资料不足的矛盾。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识还存在局限性,在“大跃进”等运动中,“向自然开战”“人定胜天”等错误理念导致盲目毁林、围海围湖造田等行为屡见不鲜,造成严重的生态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挫折过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有关工作。1972年我国派团参加联合国首届环境会议,学习他国生态环境保护经验。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制订了新中国首个环保工作方针。这一阶段,同我国其他领域建设状况一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处于起步发展时期,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对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的初步探索,为开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筑了坚实根基。

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式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航程,在短时间内就赶上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相伴的却是生态问题的恶化。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不可或缺的主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全面审视我国发展问题时,充分认识到在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对于如何打破资本逻辑主导的以生产无序、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现代化“僵局”,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绿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得到快速发展。一是“绿色”理念不断深化。从党的十三大提出“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12]25},到党的十五大提出“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3]28},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发展,再到“生态文明”作为全新理念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回望这一历程,无不昭示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有了更为全面、深刻、具体的认识。二是“绿色”制度不断完善。1978年环境保护有关条款被写入新修《宪法》之中,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出台,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修订通过。此外,针对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污染治理、自然灾害防治等不同领域的法律法规陆续颁布并得到相应落实。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步入了制度化、法制化轨道,编织起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网络。三是“绿色”策略和实践不断创新。1979年,每年3月12日被设立为我国植树节,植树造林、爱绿护绿的优良传统得到有效传承;1983年,环境保护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揭开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新篇章;1992年,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正式提出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我国第一个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全面贯彻;1998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对到21世纪中叶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目标作了近期、中期、远期的规划;世纪之交,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江泽民指出“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4]343}。在西部开发火热实践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此后,建设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战略措施陆续实施,在党的十八大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此期间,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先后缔结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国际公约,承担起了应尽的大国责任。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深化,生态保护经验持续累积,生态保护的活力与动力持续涌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了更加

突出的位置,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措施,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逐步完善和成熟。一是党和国家的总体布局精准到位,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将“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将“美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更高要求。2023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进一步明确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节点、主要任务、阶段目标等,为美丽中国建设擘画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系列法律、制度、政策、规范的出台和落实,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2014年修订了被誉为“史上最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环境保护领域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又相继修改和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十年来,我国制修订30余部相关法律法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严密的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动力。再次,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2018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发布,2021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发布,2023《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重新修订,为全体人民共建美丽中国做出了具体的规范。三是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一系列措施使得我国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此外,我国还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并落地生效、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及《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等都展现了大国担当。新时代,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代表的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实践开展得如火如荼,不断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和

广度,将对“绿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推向新的高潮。

三、现实回应:时代之需、社会之要、人民之盼的解答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5]592}也就是说任何理论形态、目标任务或政策举措的产生,都必定有其现实基础和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对“生态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全球生态危机化解”等现实问题的反思、回应与解答的实践之中,始终贯穿着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展现出扎实的现实根基与清晰的实践理路。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旨趣的诠释。“人”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互动中,“人”始终作为核心力量推动着实践的发展,在其中扮演着受益人和责任人的双重角色。“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念,也是开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发挥人民作用。一方面,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需要。“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16]157}新时代,人民从过去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转向了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绿色”成为了美好生活的鲜亮底色,良好生态成为了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如何在解决好人民急难愁盼生态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帮助人民实现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态愿望。首先,坚持生态为民,着力化解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反映最强烈、要求最急迫的生态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自然是生命之母,干净的水、洁净的空气、适宜的气温等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安全的基本保障。当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仍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安全,对人类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挑战,生态危机的消解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渴望。其次,坚持生态利民和生态惠民,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满足

人民群众的发展和审美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17]25}。除了物质生态产品的需求提升外,人民群众也更加重视和向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诗意的栖居”等生态美学带来的精神生活的洗礼和享受,从而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境界。另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运用人民的智慧及力量。马克思曾提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3]46}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是一项兼具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关键在于发动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长期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绿化祖国,改善生态,人人有责”等工作方针,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各自聪明才智,努力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共参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此外,还是在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17]7},良好生态既是当代人的民生福祉,更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要秉持着对当代人及后代子孙同样负责的态度,努力实现良好生态的代际传递与共享。“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46}人民有所呼,党即有所应。党与人民相互呼应的生动实践,深刻回答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所内蕴的目标要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完成“高质量发展”任务的响应。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8},“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1]50},“绿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针对如何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的回答”^[18]。以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走出人类曾一度陷入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二元对立陷阱,找到在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双赢的正确道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方面,经济高

质量发展过程内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大动力,能够推动生态高质量保护,促进生态危机化解。绿色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内涵,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以生态优先、绿色低碳为引领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过程中,将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格局,各类资源将得到节约集约利用,能源危机得到有效纾解,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将持续深入展开,环境污染得到妥善防治。另一方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自然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19]550}“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20]586}这表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自然条件是推动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生产力,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7]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带来的良好生态成果既可以直接提供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也可以提供优美自然景观、绿色农副产品、繁茂森林植被等优质生态产品,通过发展旅游业、实行生态补偿机制等方式转化为经济效益、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反之,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则会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施行高能耗、高污染的粗犷的发展方式的确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生产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相伴而来的是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和巨大的生态危机,最终反噬经济发展,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甚至是停滞和倒退。发展是硬道理,但绝不是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也不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换得良好生态,而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50},形成生态“高颜值”与发展“高质量”双轮驱动、良性循环的生动局面。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推动“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担当。当前,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生态问题严峻,全世界共同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携起手来一起

应对生态危机、加强生态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地球生命共同体”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在生态问题上的命运与共,在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态危机中,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国应该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发挥各自作用,承担相应责任,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着眼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对全球绿色转型发展潮流及全球生态危机治理共识的回应,展现了中国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责任担当。其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通过解决自身生态问题,推动全球生态危机治理。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就是最好的体现。针对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增加所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中国作出了郑重承诺,力争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增长,达到峰值后逐步降低;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方式,抵消由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并推行碳排放交易、能源革命等制度、措施,确保目标的如期实现。此外,中国还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使得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得到系统性保护,全球生态安全屏障持续筑牢。其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通过转变发展方式,顺应全球绿色发展潮流。人类长期的生态治理实践证明,就生态治理生态的方式非但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导致问题更加严重。唯有清晰认识到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及时调转发展方向,采取绿色发展方式,才能真正化解矛盾。针对生态治理,国际社会经历了最初就生态谈生态的治标不治本的治理方式,到如今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系统治理方式的转变,绿色发展在全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绿色发展潮流不谋而合,是适应全球绿色发展潮流的结果,二者都以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内生治理为治理模式,通过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破解生态

治理难题,推动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周宏春,戴铁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时代意义[J]. 生态经济,2023,39(1):13-24.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余玉湖,李景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图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5):42-48.
- [5]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6] 庄子. 庄子·齐物论[M]. 孙海通,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7] 旷藏. 古尊宿语录[M]. 萧萐父,吕有祥,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8]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893-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毛泽东论林业[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4]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8] 董慧,汪筠茹.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意蕴及其经验启示[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3):23-30.
- [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Basi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alistic Response

ZHENG Hong-hui^{1,2}, WANG Li¹

(1.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highlights its ecological dimension. In addition to absorbing the wisdom of hu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ch as Marx and Engels' ecological thought, Xi Jinping's thinking on eco-civilization, fine Chinese traditional eco-culture, and western ecological idea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herits the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responds to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Whom is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undertook for and relying o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ow can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be resolved". In the latest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theoretical basi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alistic response of its ecological dimension, and to constantly break a new frontier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which people and nature coexist in harmony.

Key word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eory; history; reality

【编辑 高婉炯】